

百家丛书

绿灯小集

邵益輝

•百家丛书•

绿 灯 小 集

邵燕祥

人民日报出版社

封面设计：曹辛之

责任编辑：张炜天

·百家丛书·

绿 灯 小 集

邵燕祥

*

人 民 日 报 出 版 社 出 版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北京 发 行 所 发 行

787×960毫米 32开本 印张5.25 字数83千字

1987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书号：10132·066 定价：0.95元

编者的话

《百家丛书》同读者见面了。

我们愿把这份精神上的礼物，奉献给一切关心改革、思考改革和从事改革的人们。

本丛书定名为“百家”，是取“百家争鸣”之意。本着这一宗旨，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国内专家、学者、作家和各界人士有关意识形态的各种问题的著述和作品。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著述和作品，为广大作者和读者提供一个小小的百花园和群言堂，使之起到开阔视野，活跃思想，交流信息，启发心智的作用，从而为党所领导的改革和开放政策服务，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服务，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

我们欢迎各界人士为本丛书投稿；欢迎对本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提出批评和指教。

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前记.....	(1)
岁暮祭书神.....	(3)
话痛痒.....	(7)
读《儿子》.....	(10)
士兵诗话.....	(14)
关于苍蝇的联想.....	(17)
再说“唤起”	(21)
〔附一〕说“唤起”	(24)
〔附二〕也说“唤起”(方放)	(27)
说“时髦字眼”	(30)
说开会.....	(34)
探索：这是一个崇高的字眼.....	(38)
说禁忌.....	(43)
谁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46)
听歌记感.....	(49)
尚未失传.....	(52)

论优越感	(55)
故事和真事	(59)
就重在朝朝暮暮	(62)
改革万岁!	(65)
也谈“隐私权”	(69)
《雾失楼台》：一首电视诗	(72)
说“低沉”	(74)
世无完人论	(78)
公款私用论	(82)
未能免俗	(86)
似曾相识话顾荣	(89)
两件小事	(92)
春风吹不掉错别字	(95)
国格与家丑	(98)
说嚼蜡	(101)
幽默辨	(103)
西施故里篇	(106)
〔附〕西施出诸暨（高逸）	(109)
当代可以入史	(112)
说“后生可畏”	(115)
春末漫笔	(119)
车祸与人祸	(122)
读《艺海沉浮》	(125)
晚说了三十年	(129)

《三国》一锦囊	(132)
小议死后之事	(136)
人咬人	(139)
咬文嚼字	(142)
标签	(146)
今天里的昨天	(149)
“粉碎”和“彻底否定”	(152)
漫谈“经典”	(156)

前记

昨日立秋，今天便觉新凉。想起辛弃疾那首有名的《丑奴儿》：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这两种境界，我都有经验。而两者偏都是写杂文的大忌。杂文，杂感文也，有感而发，不同于无病呻吟的舞文弄墨，怎么能无愁“强说愁”？既然有话要说，不吐不快，为什么王顾左右而言他，“今天天气呵呵呵”呢？与其不痛不痒，还不如什么也不说。

杂文都是自己要写的，没哪个强迫你。一不能卖钱，二不能邀宠，倒是肯定会得罪人，树敌招忌。但是在半个世纪前的无声的中国，还有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作者群，难道在今日中国，天籁人籁之间，就不需要杂文，就不需要杂文作者

的条分缕析，指陈时事，以至嬉笑怒骂、呼呼呐喊之声了吗？

不需要的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不需要的只是“却道天凉好个秋”。

我多年来主要是兴之所至，写些抒情小诗。近来，特别是从一九八四年初至今，转而多写杂文，——“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一方面也是找到了一个能对社会生活及时作出反应，能把我和群众的一些思考、情绪、意向直接加以表达的形式。自然不是无病呻吟，而且即使是面对某些客观存在的弊病和精神领域的锢疾，也是谋求疗救，而不出以呻吟的。

至于有时意思失于浅，是思想水平所限，看得不深，并不是故意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敷衍读者。总之，我说了我想说的话，“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这里收的杂文，多是一九八六年上半年所作。

邵燕祥于一九八六年八月九日

岁暮祭书神

鲁迅年轻的时候，在一九〇一年初即旧历庚子年除夕，写过一篇《祭书神文》。这是千家万户准备礼拜财神的时候：“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作者欢迎那被人间冷落的书神，驱着蠹鱼驾的车，到笔海、文冢之间一游，“绝交阿堵（钱）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作者和书神一样鄙视金钱，宁肯召唤书癖和诗囚来作伴，“宁召书癖兮来诗囚，君为我守兮乐未休。”这是少年鲁迅天真的雅兴。当时他很难预料三十多年后会写出“文章如土欲何之”的吧。

岁聿云暮。面对着架上少量历经劫难的残书和近几年重新添置的图书，又喜又忧，谈不上百感交集，却还是有些感触。

从全国来说，一九七六年出书一万三千种（这里面有好书，当然也不乏帮腔帮调的），以后是一万五，一万七，一万九，两万一，逐年增长，

到一九八四年是三万五千九百多种，总印数达到五十亿册以上。这在十年前怕还是不敢想象的。尽管我能买的书、能看的书有限，可在出版物的品种、印数、质量都在提高的趋势下，我买所欲买、读所欲读的愿望和需要必然可以得到保证。这怎么不叫人高兴？

但是从去年下半年起，我就听说出版事业告急。据说新华书店拒绝预订许多著作，或者订数很少。在“征订包销”三十年一贯制的制约下，新华书店预订数不足，出版社就难以开印，甚至难以发稿。许多家出版社因而压缩了文学艺术、科技专业、社会政治各方面的出书计划。有人预计，把已经发稿的书在两三年内出齐以后，书籍市场可能出现一片荒凉。如果不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然而，出版是我们科学文化的阵地啊。倘若真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精神文明的建设将遭到多大的损失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出版事业的低潮，整个文化界、读书界投入了讨论。读者、作者、出版工作者、发行工作者从各方面揭出了钱神冲击书神的问题，批评了在全国有六十多家出版社单纯追求利润，不顾社会效益，出版了一些不健康书刊，以及有不少出版社规定经济收入的指标来考核编

辑工作，换句话说就是以出书赚钱多少定优劣，等等。在端正出版工作的业务指导思想，并进行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有些倾斜可望很快纠正，有些积久的问题也可望逐步找到解决的途径。

在不由自主的忧虑之后，我对前景还是乐观的。不过想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想到书神如何不为钱神左右，我心里仍然感到不够落实。

归根到底有个钱的问题。

出版工作，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应该经过改革改善经营，力求节约开支，并在可能条件下创造利润。然而，向作为文化工作部门的出版社，跟向经济工作部门的生产企业一样，要求上缴高额税利，是否适当，值得考虑：怎样才能更符合党中央关于文化事业没有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任务的指导思想，也更有利于在出版工作中“以丰补歉”，支持一部分不赚钱甚至赔钱的优质图书的出版，并促进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繁荣。

我于财政经济，如同于出版工作一样外行。可听了一些出版界朋友议论他们的苦衷，也觉得同情。现在谈出版工作的社会效益多，认为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完全正确的；而关于“出版部门也要讲经济效益”，一般虽只是一笔

带过，但是经济效益的指标却是硬任务啊！除了寄希望于适当降低对出版社的财政经济要求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我想不出。这是需要身在改革实践中的出版工作者来研讨的。

作为一个读者，一个爱书的人，在岁暮祭书神之际，馨香祷祝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比翼腾飞，我们社会主义的钱神招财进宝，并给书神以援手，使出版事业度过危机，一片兴旺，使我们家家的书架，处处的书店，新书好书，与日与时俱增！

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
(载一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

话 痛 痒

动了一次手术，也许是影响了神经的机能吧，五官之一的舌头，有半边麻木了；这是事先预计可能发生的，手术前已经签过字了，不说它。刀口附近的部位，至今时而隐隐有痛感，痛当然不舒服，可是在手抚着痛处时，从潜意识到上意识，想的倒是，既然还能觉得痛，说明这里的神经还在起作用，乃是一大幸事。

在我身上不曾发生麻木现象以前，听过一个外国笑话：有位老先生总担心慢性病发作，比如脑血栓之类，于是经常掐一掐大腿，试试自己的感觉有没有故障。这一天正在饭桌上，他忽然大惊失色地宣告：“我的腿麻木了，掐上去毫无感觉。”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太太说：“你掐的是我的腿！”

医生可以从疼痛来诊断疾病，而象局部麻木本身，也已经是一种感觉障碍，更不用说可能是

某些重病的症状。那位外国老先生的惊慌完全可以理解。

因此，是不是可以说，能知痛痒（痒是微痛），总比麻木强。

过去说到革命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时，常引用鲁迅说的话：“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神经麻木了，必然也就无所措手足。今天，我们的作家不仅应该知自己的痛痒，而且推己及人，应该体会正经历着历史的蜕变的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改革者的痛痒，全体人民从不同角度介入的四化事业的痛痒；并且把这种痛痒通过各种形式写出来，不仅自己不能麻木，还要使麻木者警醒起来，振奋起来，投入伟大的实践。“感应的神经”就这样感受着时代的脉搏。社会主义文学是激发人的热情、振作精神的文学，又是使人保持清醒、摆脱麻木的文学。这如果不是文学的唯一的功能，也该是主要的功能吧。

四十年代初从贵阳狱中传出过一位无名烈士的遗诗，其中有一句：“相关痛痒见交情”。一切同命运、共患难的同志和朋友，都是休戚相关、痛痒相关的。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之所以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工作者，最不可缺少的，最可宝贵的，就是这种与从事建设、改革的现代化大业的普通人体戚相关、痛痒相关的感

情；正如同所有的干部，也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与群众休戚相关、痛痒相关的感情，才可能被承认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干部一样。

那首无名烈士诗的全文是：“走尽崎岖路几程，寸心原欲救危倾。黄花寂寞锁深院，浓雾弥漫罩古城，忍受折磨堪砺志，相关痛痒见交情。劝君正向光明面，心自安详气自盈。”

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

（载二月九日《光明日报》）

读《儿子》

整整四十年前，从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林陵等同志译的《苏联卫国战争诗选》的介绍中，得知有阿丽格尔写卓娅和安托柯里斯基写儿子的两首长诗，渴望一读（后来知道这两首诗先后获斯大林文学奖金）。前者，五十年代初以《真理的故事》为题译介到中国来了；而后者，却直到今天才见到智涛同志的全译本。回想四十年代中期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读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诗歌时那种激动、悲愤、钦慕、向往交织的感情，恍如昨日。我比安托柯里斯基当年悼念的生于一九二三、阵亡于一九四二的儿子小十岁，而现在我的年纪已经比诗人遭遇殇子之痛时还要大好几岁了。岁月如流，时间真是不饶人的。多少伪造的历史被纠正，多少伪装的面具被揭穿，多少矫饰的甚至只是平庸的作品被淘汰，而象《儿子》这样近千行的、基本上并无什么情节的长诗，仍然使我如面